

王继平 著

嬗变与 回归

——近代

中国知识分子

参与意识和模式研究



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



内 容 提 要

本书以翔实的史料、畅达的文笔,运用历史学与文化学的方法,系统地阐述了中国近代知识分子的参与意识与模式的演变与发展过程,揭示了在时代与社会巨变的近代中国,知识分子探索拯救民族危机和变革政治的道路的心路历程。介绍了近代知识分子从士大夫到新士人再到近代型知识分子的蜕变过程,同时也经历了从依附到独立的心理转换过程。近代知识分子的命运始终与政治相联,是近代政治变革和社会进步的先进力量。

序

王继平同志的《嬗变与回归——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参与意识和模式研究》一书近日付梓，要我在卷首写上几句话，甚感欣慰。然而，这几句话不可名之为“序”，只作为该书的第一个读者的几句感慨而已。

关于中国近代知识分子的论著，近年渐多，某些方面的研究进展甚大，某些方面自然尚存在分歧。关于分歧的原因，我觉得主要不在史实上，而在史论上。一些论者对中国近代知识分子这一概念的理解就很不一致。有的把中国近代知识分子与中国近代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两个概念等同起来，认为“近代知识分子应具有一定的资产阶级政治思想意识，有相当程度的西方文化素养，并投身于发展资本主义的社会事业。”按照西方知识分子发展的路子，这样说，也未尝不可。西方的近代是比较典型的资本主义时代，西方近代知识分子无疑以具有强烈的资产阶级意识为其特征，它是依附于资产阶级的一个社会阶层。然而，对中国近代知识分子就不能持完全同样的看法。这要联系中国近代的特征和社会性质来立论。中国近代是个转型的时代，是个过渡性的时代，其社会性质也不是某种典型的社会形态，一般认为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在这个近代社会里，经济成分复杂，阶级成分复杂，依附于其上的知识分子阶层也是复杂的。中国近代知识分子无疑包括依附于各阶级的知识分子。中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只是中国近代知识分子中服务于资产阶级的那一部分。在中国近代社会中，除原已存在的地主阶级、农民阶级之外，又新产生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所以，中国近代

出现了代表前后三个时代、三种社会形态的阶级，即地主阶级、资产阶级、无产阶级同时并存的状况。因此，中国近代知识分子队伍的成分并不那么单纯，相应地出现了地主阶级知识分子、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无产阶级知识分子同时并存的状态。当然，不是近代所有时期都如此，至少有一个相当长的时期是并存的。所以，所谓“中国近代知识分子队伍形成”的问题，实际上是不存在的。只存在中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队伍形成的问题和中国无产阶级知识分子队伍形成的问题。

中国近代知识分子虽然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是多种成分并存，但各自并不稳定，时刻在变化。中国近代知识分子变化的基本路子是与社会进步同向的。一般是地主阶级知识分子转变成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转变为无产阶级知识分子。

中国近代知识分子作为文化的创造与传播主体，也是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的重要领域。继平同志从文化史的角度，通过对近代中国文化发展的整体考察，对中国近代知识分子的文化心路历程进行了系统的探讨，可谓独辟蹊径，自成一家之言。作者以近代中国知识分子自身的文化角色的变换——即从传统型士大夫到近代型知识分子的转变——和他们变革近代社会的两个方面为线索，系统地考察了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在近代文化剧烈转换、民族危机空前严重和近代政治风云变幻莫测的社会环境中，他们的价值观念变迁、行为模式转换乃至文化心态的转变过程。作者认为，中国知识分子在近代社会中，伴随着社会的变迁和西学东渐的过程，其角色地位经历了一个从传统型的“帝师王佐”型旧式士人到近代型参与变革的知识分子的转变过程，即由传统的改革派士大夫到具有资本主义意识的维新改良派（作者称之为“新士人”），再到近代型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三个发展阶段。与之相适应，他们参与政治

变革的形式,也经历了倡言洋务、宣传维新和发动革命等三个相嬗递和发展的阶段。这就清晰地勾勒了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文化与政治价值嬗变的轨迹,为中国知识分子在近代欧风美雨的冲击和传统文化双重危机中的嬗变描述了一幅生动的画面。

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确面临着双重、两难的选择:一方面,以坚船利炮代表的西方文化势如破竹地冲击着以大刀长矛组成的传统文化藩篱,显示出技高一筹的优越性;另一方面,洋人的经济、政治和军事的侵略,又造成了中国社会恒古未有的大变局,民族危机、文化危机等等使中国陷入苦难的社会危机。在此两难选择中,近代知识分子是沉溺于传统的情愫,固守住传统的堤坝,拒西方文明于国门之外呢?还是悲叹时光不再,为传统哼挽歌,倡“全盘西化”(或曰“充分的世界化”),行民族虚无主义之实呢?理性的选择并非上述两种,历史的实际也更非上述两种。本书作者从近代的历史事实与社会进步潮流入手,考察了近代知识分子在这种民族与文化双重危机中的艰难而又沉重的探索之路,这就是寻找东西文化的接合点。鸦片战争后魏源提出了“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观点,洋务派选择了“中体西用”的模式,资产阶级改良派和革命派则从政治制度的层面来思考和解决问题,而‘五四’一代知识分子更从国民文化心态的角度提出问题。作者认为,他们都没有找到契合于中西文化、促使中国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现代转换的正确道路。然而,他们的探索,又确实体现了中国知识分子探求真理、寻求正确道路的一个向上发展的过程。作者对这一过程的阐释,使我们看到了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在这一过程中痛苦而又积极前进的心路历程。这是一个有益而且成功的探索,对我们深入研究这一领域有着积极的意义。

继平同志 13 年来一直从事中国近代史的教学与研究工作,又

从师林增平先生,近年来则专攻中国文化史,辛勤耕耘,收获颇丰。在本书中,他的思维之深邃,论点之新颖,史料之运用自如,文笔之流畅,读者阅之自见,毋须赘述。尤其可贵的是,在目前商潮冲击下,学术界也呈现出功利主义的浮躁与浅薄倾向,继平同志能努力向学,以老老实实的态度治学,实在难得。民族的振兴,现代化的建设,祖国优良文化的延续和发展,需要大批大批的青年学人之为之奋斗。这本专著可能难见于各种书摊,只能为少数有机遇得到者所赏识。但是,一本著作如果能同民族文化事业的发展多少有点联系,就值得庆贺。此种联系越大,著作的生命就越长。

徐泰来识于茹苦斋

1994年11月24日

目 录

导言：中国政治结构与中国知识分子的参与意识和模式	(1)
第一章 从龚自珍到魏源：传统的沿续与潜变	(21)
一、龚自珍：向传统寻求出路	(22)
二、社会的大变局与士林风气的演变	(31)
三、林则徐：具有近代意识的第一位知识分子	(39)
四、魏源：对西方政治参与模式的新思考	(50)
第二章 对传统的反叛与回归	(56)
一、洪秀全：落第秀才的愤懑与反抗	(56)
二、新王朝：太平天国的政治构架	(66)
三、农民政治与知识分子	(73)
四、《资政新篇》：农民的西方政治试验	(83)
第三章 在传统与变革之间	(94)
一、洋务派：对传统的变革与维护	(94)
二、清流派：在变局中的踌躇与分化	(103)
三、早期维新派：对洋务模式的反思与超越	(113)
四、中体西用：走向现代化的新步幅	(124)
第四章 从传统到现代(上)	(135)
一、现代化的深入与传统士人的蜕变	(135)
二、君民共治：新士人群体的参与意识与模式	(146)
三、谭嗣同与唐才常：对新模式的新思考	(158)
四、清末政治开放下的群士图	(165)
第五章 从传统到现代(下)	(173)

一、近代型知识分子群体的形成和发展	(173)
二、革命：近代型知识分子变革政治的方式	(183)
三、民主共和：近代型知识分子群体的政治变革目标	(192)
四、去意徘徊：知识分子与民主政治结构	(202)
第六章 旧格局与新时代	(211)
一、宋教仁案：民初的政党政治与知识分子	(211)
二、困惑与迷惘：强人政治与知识分子	(221)
三、强权与知识的冲突：进步党的兴衰与名流内阁的末路	(230)
四、新追求与旧思惟：嬗变与回归的新轮回	(241)
结语：走出“怪圈”的漫长之路：知识分子的命运与中国民主政治	(248)
后记	(258)

导 言

中国政治结构与中国知识分子的参与意识和模式

中国的知识分子似乎与中国政治结下了不解之缘。尽管一批批知识精英、志士仁人在专制权力的桎梏和政治家的淫威下流血献身,但中国知识分子忧国忧民的忧患意识从未枯竭,中国知识分子参与变革政治的行动也从未中断,中国历史上每一幕可歌可泣的政治变革的壮剧,每一场社会革命的运动,都有着知识分子的鲜血和头颅贡献于民族之魂的祭坛。从春秋时期游说各国、试图以自己的学说辅佐政治的孔子,到献身改革、遭残酷车裂之刑的商鞅;从“我自横刀向天笑”、悲壮就义的变法志士谭嗣同,到致力于国民革命凡四十余年、创建民主共和国的孙中山,中国知识分子用自己的行动,推动着中国社会历史的进步和政治变革的发展。

中国知识分子参与政治的意识与模式,是与知识分子的力量、群体结构、心理素质等自身因素的发展与变化相适应的,也是与中国历代的政治结构紧密相联的。

知识分子是社会历史发展到一定时期的产物。作为社会精神产品的生产者,知识分子产生的历史条件,便是在原始社会瓦解、奴隶社会产生之际,社会生产有了一定的发展,开始有了若干剩余产品,文字开始出现,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分工出现。在中国,奴隶制时代的夏、商、周三代,执行卜、巫的神职人员,大约是中国最早的知识分子了。进入封建社会以后,伴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文化教育事业的发达以及科学技术的进步,中国知识分子的队伍便逐步扩大,形成了各种类型、执掌各种职业的知识分子。

在传统中国典籍中，知识分子一般称之为“士”，所谓“士农工商”，构成古代中国社会结构和利益集团的基本划分。当然，在中国封建社会，由于科举制度成为选拔官吏的基本制度和教育制度的基本目标，故在一般意义上，传统社会的“士”或“士大夫”，也包括政府的现任官和候补官，尤其是文官。因此，“士”是古代中国社会中对从事脑力劳动的人们的一般指称。

知识分子是社会精神生产的主体，与社会的精神文明相结合，具有较高的文化修养和对历史经验教训的把握。因此，他们在思想意识和政治意识上，总是最富敏感的一部分。在历史发展和社会变革的进程中，知识分子往往发挥着巨大的作用，尤其表现为强烈的参与社会政治的意识和参与实际政治变革的行为。

在中国古代，传统的知识分子——士大夫是具有强烈的参与政治的意识和能力的。他们在不同的王朝和历史时代，以其敏锐的政治意识，提出了各种不同的“治国平天下”的方案，并且总是以极大的热情参与实际的政治活动。历代知识分子的格言名句，如“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反映出中国知识分子强烈的参与政治的心态和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另一方面，历代统治阶级为了保持其统治秩序，也广泛地吸引知识分子参与政治，为自己寻找谋士或智囊。这样，古代中国社会便出现了许多名垂青史的杰出士人。如治国安邦的肖何、敢谏善谏的魏征、心忧天下的范仲淹、铁面无私的包拯、抗金名将岳飞、刚正清廉的海瑞、“不食周粟”的王夫之等等。

中国古代的知识分子参与政治的意识虽然强烈，并且也通过这种参与推动着中国社会的进步，但是却始终处于依附的地位，没有形成独立的政治利益集团，也不具备在共同利益关系基础上形成的、具有共同思想目标的群体意识。因此，在王朝兴衰更替的过程中，在各种政治利益集团的互相斗争中，特别是在封建统治阶级内部保守与革新、中央与地方的争权夺利的矛盾冲突中，知识分子往往依附或背离于某一政治集团，形成互相容纳或彼此对立的阵

营,在历史上起着进步或落后的作用。从整体上来看,中国古代社会知识分子的命运是与封建王朝的兴衰荣枯相始终的,成为王朝治乱、更替的政治工具。这种附庸的地位,往往使中国古代知识分子成为专制政治的牺牲品。

中国古代知识分子所以有这种地位和命运,原因是多方面的。传统中国封建社会是以使用手工工具为标志的小生产经济形态。这种经济结构中,经济的发展主要依靠劳动者的体力,依靠一代代传授的经验和技艺来进行。虽然这种缓慢增长和缺乏变化的经验与技艺也包含着脑力劳动者的劳动成果在内,但毕竟不表现为显著和清晰的外化形式。因此,传统的知识分子在经济上并没有处于主导物质资料生产和直接参与国民分配的地位。知识分子在经济上处于依附的地位,形成不了独立的社会政治利益集团。

但是,传统中国知识分子的地位与命运,更主要的是与传统中国的政治结构相联系的。

中国自秦汉以来,就一直是专制主义的政治结构占主导地位。在这种政治结构中,专制皇权及其政府控制了一切,包括所有的经济与政治活动、思想与文化意识,甚至一切社会团体和家庭组织。因此,在专制政治结构的社会中,不可能出现独立的社会与政治集团。所谓“士农工商”,只不过是传统社会人群的职业划分,并没有利益集团划分的涵义。

专制政治的特征是皇权高于一切,“普天之下,莫非王臣;率土之滨,莫非王土”,皇帝主宰着人们的一切,从荣华富贵、仕途高升到衣食住行、生杀予夺,都取决于“龙颜”的喜怒哀乐和主观好恶。专制政府及其官吏,只不过是皇权意志的体现者和执行者。社会的各个层面,从政治到经济、从文化到观念,都渗透着专制政治的影响,都是环绕着皇权这个中心运作的。因此,在这个社会中,个人没有独立意志可言,皇权及其体现皇权意志的一切政治原则、道德规范支配着个人的日常生活。人们不可能有着游离于皇家意志的任何独特的思想和意识,即使有,也毫无例外地遭到摧残和禁锢。这

样,就不可能形成独立于皇权或游离于专制社会结构之外的社会力量。包括知识分子在内的人民群众,都没有也不可能结成独立的利益集团,对社会政治变革和进步进行根本性的推动与变革。他们的活动,只是在皇权允许的范围内,以个人的形式,运用个人的智慧与才能,为社会政治的变革贡献力量。所以,在传统中国的专制政治结构的社会中,知识分子大抵只是充当着“帝师王佐”的辅佐与智囊型人物。他们在政治变革中的作用,也只是通过帝师王佐的身分来塑造一个开明贤达的“皇上”,或影响皇上的决策和政略,将自己的政治理想和抱负转变为皇帝的意志,并通过庞大的皇权统治网加以实施。古代中国知识分子的这种参与模式,是带有明显的依附色彩和随机性的。知识分子的政治理想与变革计划的实现与否,主要是依赖于皇帝个人的主观好恶,甚至取决于皇帝不同年龄时期的个人生理与心理状态。从中国历史上一些王朝的政治清明与昏庸、兴旺与衰落可以看出,君主即位之初或年富力强之时,政治处于开明兴旺状态,王朝末年或君主老态龙钟之时,政治则腐败衰落。这种状况也使充任帝师王佐的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处于不可捉摸的状态之中。而且,大凡以革新政治为己任的知识分子都没有善始善终的个人命运的完美终结,即使是曾经得到皇权的赞赏与支持,获得一定成功的知识分子,最终也大都以悲剧的结局而告终。“伴君如伴虎”,这个通俗的格言是充当帝师王佐的传统中国知识分子无法把握自己命运的状态的深层原因。

中国知识分子在传统专制政治结构中所处的依附地位,就决定了知识分子参与政治和政治变革的途径只能在专制政治结构中所能允许的范围内选择。一般来说,科举与充当内外大臣的幕僚是传统中国知识分子参与政治的基本模式:

科举制度是自唐代以来中国封建政府选拔官吏的主要途径,至清末废除科举之时,这种制度沿续了一千多年。历代统治者通过科举网罗了大批的知识分子参与政府的管理和决策,而知识分子则通过科举制度进入仕途,参与对政治的管理与变革。所以,科举

制度实际上成为沟通传统社会政府与知识分子之间的媒介。对于统治阶级来说，科举不但是选拔官吏的制度，而且是笼络知识分子为我所用的统治术。除正当的科举考试之外，统治者还每于特别的时间或场合，如新皇即位、寿诞、大起义之后等等，开辟“恩科”或特试，取士入仕，以显“皇恩浩荡”，实则收买人心，笼络士人，以固统则。对知识分子来说，科举既是他们接受教育的唯一途径和目的，也是他们参与政治的基本道路。因此，在封建时代，知识分子都毫无例外地追逐着功名，以科考为终生追求的目标。事实也是如此，在封建官场能够身居显要，不论其政治态度是保守的还是进步的，大凡都是经历了科举取得功名的知识分子。科举制度可以使那些不论出身寒微或富甲一方的士人，一旦金榜题名，便可受官为吏，所以它的魅力是相当大的。历代都有皓首穷经、终生以科考为能事的士子书生。范进中举，立时使平日骂不绝口的屠夫老丈和为富一方的地方富绅恭敬不已，这是因科举中榜可以使昔日的一介寒士立时成为官服加身、左右侍奉的官员的缘故。舍此，知识分子没有其他的“正途”入仕。故此，科举入仕是传统中国社会知识分子参与政治的基本选择。

但是，科举考试的金字塔式的取士形式，提供给知识分子选择的机会毕竟太少。于是知识分子便有了第二条入仕或参与的途径：充当幕僚，或曰参幕。

参幕是传统社会的一个特有的政治现象，也是专制政治吸收人才的重要途径。在科举实行之前，招士充幕就已经是中国传统政治中盛行已久的现象了。大抵一方诸侯或地方疆臣，都有一批文人学士充当文案、书吏或谋士。这些士人一般被称为幕宾、门客、食客等等。战国时孟尝君门下就聚集了“食客”三千，可见其幕僚之众，其中还有弹铗求车的冯援。中国历史上一些著名的政治家，不论是忠君奉主、还是韬晦谋位，都网罗一大批文人学士为幕，造就出功垂千秋或遗臭万年的事业。

科举制度确立以后，虽然大批士人通过科考而进入仕途，但充

幕仍然是传统知识分子参与政治的重要途径。在众多的科举士子中,能金榜题名,高中进士者毕竟少数。落第的士子除一部分选择教授弟子之类的职业外,那些热衷于官场、有志于参政的士子,便大都投身权臣疆吏的门下,充当幕宾,希图得到幕主的赏识,或取得经理文案的经验,获得幕主的保荐,而被皇上所恩取,进入仕途。当然,也有终生为幕,老死幕府的人。

充当幕僚的传统知识分子,他们与幕主的关系是多种多样的,大致有这样几种:第一种是为幕主策划军机大事、重要政务的谋士,这种谋士一般与幕主关系密切,属于高级幕僚;第二种是充当刑名、钱谷、盐法、河工等具体事务的文案人员,大抵都有一技之长,或是某一事务的专家,承担具体的工作;第三种是邂逅入幕的,他们或骤致大用,或甫入旋出,散往四方的;第四种是以宿学博识客戎幕府的,他们在幕府从容讽议,往来不常。后两种幕宾并不承担经常性的工作,与幕主的关系较前两类更少依附性,也不支取幕主的薪俸,只是听任幕主随时致奉仪礼。

由幕而仕是传统中国知识分子科举而外的重要入仕途径,也是封建政治吏制的显著特征,其流风余韵至今仍不衰绝。一方面,科举制度只是传统社会选拔官吏的一种制度,而非现代意义上的文官制度。因此它并不能保证封建政府官员能够全部公正地通过科举制而获得,这样,由幕而仕就成为科举制度之外的重要补充途径之一;另一方面,封建政治的特权意识和任人唯亲的裙带关系,使封建政府的官吏愿意网罗一批文人学士充当幕僚,再荐往各个部门,占据显位要职,形成一种权力网。

由幕而仕的确为统治阶级提供了一批各方面的人才。清末曾国藩的幕府就网罗了一大批各种各样的人才,参与机要、治军书,或散往营务处、粮台、转运局、支应局、筹饷局,加以培养,最后用破格超保的办法,启用幕宾次第。清末地方疆臣、将帅,如李鸿章、左宗棠、李元度、彭玉麟、黎庶昌等等,大都在曾幕中充任谋士或担任机要等事宜。通过这种途径,一些落第秀才如左宗棠,或功名不高

的士子如汪士铎，都由科举而外走入仕途，实现参与政治的愿望。而曾国藩也由此“引出一班正人”，为清朝统治培育和输送大批人才，并形成了湘系势力集团。

科举入仕与充幕入仕是中国传统社会中知识分子参与政治的两条基本途径。尽管这两条途径在不同程度上存在着诸如营私舞弊的现象，影响了一部分士人的正常入仕，但一般说来，它还是以个人的素质与才能为基本标准的，故出身寒微的士人也可以通过这两种途径改变社会地位，成为统治阶层中的一员。在以官为本位的传统社会中，吸引了大批士人之为奋斗，所以就有白头老翁仍为求一秀才而屡试不休的现象。这种制度也为封建统治者扩大统治基础提供了条件。因此，通过这两种途径入仕的知识分子，其价值观念和政治行为取向大都是囿于传统即统治者所能容忍的范畴。他们对于政治的辅佐或变革，是不可能超然于传统之外的。即使在近代中国社会条件发生了一定变化的情况下，他们仍然有回归传统的可能性，如康有为、章太炎等人。

传统社会以科举制度和充幕保举的方式给知识分子提供参政的模式。一般来说，这种模式所提供的人才，都是传统政治所能认同的人。虽然通过这些途径入仕的士人在进入政坛后也不乏求新变革的人物，但是，假如超出这种范围，社会是不可能容纳的。那么，对那些叛逆传统或与传统不相吻合的士人来说，采用什么模式参与社会政治的变革呢？考察中国知识分子与政治变革的关系的历史，看来也只有两条路可供选择：揭竿而起或依附于揭竿而起的农民领袖；“采菊东篱下”——充当隐士。

揭竿而起或依附于揭竿而起的农民领袖的知识分子，大都是功名较低的士人，且多数是屡试不第，对科举制度甚至对整个现存的统治制度都产生了失望、怀疑、进而反抗的心理。考察中国农民战争的历史，可以看到有一些功名不高的知识分子发起和领导农民起义，建立起独立的政权或取而代之成为新王朝的主人。不过，这种例子是不多的。大多数对传统社会和现存制度不满的知识分

子,所选择的反抗传统的方式,是依附于农民领袖,成为农民战争领导集团的谋士与军师。从本质上来看,这种参与政治及政治变革的模式,仍然是充当“帝师王佐”的依附力量。因为对于农民战争来说,它的结局不是失败便是向封建化转变,建立一种新王朝,农民政治也是属于封建政治的范畴,它不可能超越旧王朝既存的社会经济与政治制度。在这种政治制度下,知识分子变革政治的作用,与传统封建王朝下的政治作用,仍然是相同的。

除“落草为寇”或依附“草莽英雄”之外,对现存制度不满的知识分子,所选择的另一条道路便是充当隐士,息影于乡间田野。

传统中国的隐士当然是多种多样的。有隐而不仕的,也有隐而待仕的。在唐代,隐居士人就有以下几种类型:一是粗通经业,择一闲雅安静之处读书自修,待业成后参加科举考试,取得功名;二是学已有成,借隐居读书而博高名,以待朝廷或地方长官辟用;三是对功名与入仕的愿望并不十分强烈,但如果政治环境适宜、政府再三征召,他们也会应召而仕;四是因树为屋,读书自误,视功名如粪土,睹荣华为虚无。^①唐以前与唐以后,类似于上述几种类型的隐士也不同程度地存在,隐士实际上是中国政治与中国文化中特有的。一般来说,隐而待仕的士人并不能算是真正的隐士,他们只不过是以隐居作为博取更大功名或位置的手段,其参政的模式最终归于科举或征举等“正途”。真正隐而不仕或等待政治现状变化而应诏的隐士,则是背离正途并具有独立政治意识的士人。

隐而不仕的士人,其隐居的目的各不相同。有的因屡试不第,失望于现存制度;有的虽取得一定功名,但淡泊官场或不见容于世俗纷扰;有的则曾经入仕,但对社会政治现状不满,退而隐居的。不论其具体动机如何,但都有一显著特点,便是对社会现状失望,不愿与现实政治为伍。

隐士的个人品行保留着三代时“性隐”的“野人”的质朴与敦

^① 宋大川:《略论唐代士人的隐居读书》,《史学月刊》1989年,第二期。

厚。他们不污于流俗，不世利，不苟同，特别注意个人洁身自好与品格修养。唐代隐士薛戎，隐居于毗陵阳羨里，“年余四十，不易其操”；晋代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毅然辞官归隐；类似的例子不胜枚举。

归隐田里是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反抗现实的一种途径，但同时又是他们对现实政治参与的一种曲折表达形式。归隐田里的隐士并不是没有参与意识，他们不满政治现实而向往他们认同的理想政治，这就是他们的政治参与态度。对那些隐而待仕的士人来说，隐居修性无疑是他们参与的一种模式，如同通过科举进入仕途的士人一样。只不过他们或是等待“贤相圣主”之类的“知己”召荐，或是期望社会政治环境的适宜时机而出仕。对那些终身隐而不仕的隐士来说，不与现实政治合作本身就是一种政治参与的曲折形态。魏晋时“竹林七贤”的放浪形骸、狂饮嗜丹，陶渊明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盛唐时李白等“竹溪六逸”的酣歌纵酒，明末清初王船山的埋头著述，等等，都反映了不满现状的知识分子的政治态度，那种纯粹追求“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的“世外桃源”的隐士，其实是不存在的。

近代以前，中国传统的士大夫参与政治的途径，主要就是上述科考、充幕、依附农民领袖、归隐四种形式。这些途径虽形式不一，但都体现了一个特征：依附。科考入仕参政和充幕入仕参政不仅依附于既存的封建专制制度，而且也具体依附于某一“圣主”或贤相明臣；走上反叛道路的士人，同样也是依附于揭竿而起的草莽英雄——未来可能的贤相明君；至于归隐田野、终身不仕的隐士，虽然形式上并不依附某一个人，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已经摆脱了依附心理。恰恰相反，他们的归隐，正是受依附心理支配的政治失落感促成的表现。他们不甘于依附世俗的腐败政治，而向往于理想的清明政治，当这种清明政治不能实现时，他们便隐归乡野，以寄托失落的依附情结。

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这种依附特征，使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